

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文本观

黄国友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温州 325035)

摘要: 新历史主义者质疑传统历史主义者所信奉的客观实在公正的历史观, 认为历史事件和人物是阐释的对象, 历史本质上是语言的阐释, 是借助叙述这种特殊的写作方式制造出来的文本, 而这种叙述话语又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想象和虚构的成分。所以他们的历史文本观也受到不少专家学者的诟病, 称其放逐了历史文本的最终所指。

关键词: 新历史主义; 文本; 叙述

中图分类号: I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7)05-0036-05

历史问题作为人类本体存在的时间维度是绕不开的, 尽管形式主义风靡一时, 但最终“主体与语境”、“历史与文学”仍会浮上历史地表。在1970年代后期文艺复兴研究中, “历史问题”旧话重提并引起广泛关注, 说明了西方文论界对形式主义批评的厌倦, 以及对历史语境中的文学本质有了新的兴趣。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个“没有确切指涉的措辞”, 最先使用这个标签的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他在1982年《文类》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 这个词便流行开来。新历史主义的“新”自然是与传统历史主义相对而言, 从历史方面讲, 传统历史主义关注历史事件本身, 而新历史主义对历史事件本身的兴趣不大, 他们研究的对象是当时和事后的历史书、历史小说、文献资料、民间传说、文学作品等如何反映、记载、阐释历史事件, 并从中了解它们所反映的当时当地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背景。新历史主义认为, 历史事件和人物是阐释的对象, 历史本质上是语言的阐释, 这种叙述话语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想象和虚构成分。因此, 传统历史中把历史视为文学客观公正的背景的方法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历史自身也不过是文化文本而已, 它失去了可以完全信赖的根底。

一、文本——历史的存在方式

新历史主义者所说的“历史”并不是传统历史主义者所标榜的客观实在公正的历史, 而仅仅是知识、文化、话语而已。正如海登·怀特所说: “‘历史’不仅是我们能够研究的对象以及我们对它的研究, 而且是, 甚至首先是指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方式与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联系。”^[1]由此可知, 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历史完成了一种由过去发生的事件向一种关于过去的“知识”、“话语”或文本的过渡。海因斯、赫斯特在他们合著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说: “什么是历史客体? 尽管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作出那么多的详尽阐释、含糊其辞和限制条件, 一个非常

收稿日期: 2006-01-19

作者简介: 黄国友(1972-), 男, 江西抚州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文学批评

简单的事实就是过去的就是过去了，按其定义，所有逝去的就不复存在，准确地说，历史客体就是对曾经存在过的人与事所作的‘表述’，表述的实体是保存下来的记录和文件，历史客体，即曾经存在过的东西，只存在于作为表述的现代模式中，除此之外就不存在什么历史客体……”^[2]当代批评家普遍认为，历史就是历史学家描写过去事情的方式。至于历史上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我们已无法知晓，这也不是新历史主义者的兴趣所在，他们认为历史主要有一些文本和一种阅读和阐释这些文本的策略构成。之所以说历史是一个文本，是因为历史是对过去事件的描述，描述并非对某个历史客体的纯然模仿再现，它是语言对事件的重构，因而必然渗透着语言运用者自身对事件的个人理解和阐释，也必然带有语言构成物天然共有的虚构性。因此，历史真实并不等于事实，它是事实与作家观念相结合的产物。

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把历史视为一种“历史叙述”或“历史修撰”，正是凸显了历史的文本性，海登·怀特说：“不论历史历史事件还可能是别的什么，它们都是实际上发生过的事件，或者被认为实际上已发生过的事件，作为这样的事件，为了构成反映的客体，它们必须被描述出来，并且以某种自然或专门的语言描述出来。后来对这些事件提供的分析或解释，不论是自然逻辑推理的还是叙事主义的，都永远是对先前所描述的事件的分析解释。描述是语言的凝聚、置换、象征和对这些作两度修改并宣告文本产生的一些过程的产物。但凭这一点，人们就有理由说历史是一个文本。”^[3]

二、叙述——历史的写作方式

正如前面所说，“历史”首先是借助于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联系，这种特殊的写作方式就是叙述。叙述既提供给人们以事件，又决定了人们理解这些事件的角度和方式，由此彰显了叙述者的叙述策略和叙述方式的重要作用。历史叙述也不例外，它不仅是充当文献忠实记录的功能，更是“制造”了此事件与彼事件之间的联系。我们所看到的富有意义的历史故事就是这种方式建构出来的效果。福柯认为，历史仅仅是话语活动，所谓历史的真实性、统一性、连续性都仅仅是语言阐释活动的产物，历史的表述并非客观公正的，它受着权力话语决定的话语规则的筛选和约束。海登·怀特也说过：“没有任何随意记录下来的历史事件本身可以形成一个故事，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事件只是故事的因素。事件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体的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策略，等等——总而言之，通过所有我们一般在小说或戏剧中的情节编织的技巧——才变成了故事。”^[4]所以，历史学家在进行历史编撰时往往得做下面的事情：“精简”手中材料（保留一些事件而排斥另一些事件）；将一些事实“排挤”至边缘或背景的地位，同时将其余的移近中心位置；把一些事实看作是原因而其余的为结果；聚拢一些事实而拆散其余的，这在于使历史学家本人的变形处理显得可信；建立另一个话语即“第二手详述”，它与原先话语的较为显著的表述层并存，通常表现为对读者的直接讲述，并且通常都向话语的显现形式提供明确的认知根据（就是说使前者合法化）^[5]。

在海登·怀特看来，历史只是一堆“素材”，语言便是联系历史事实的纽带，叙述者借助于叙述的力量让这些原本杂乱无序的历史事实呈现出自然有序的面貌。每一部历史文本都是以叙述的方式体现出来的，这一结构的深层内容是语言学的，借助这种语言文字，人们读到的是经过独特阐释的历史。现代语言学研究表明，语言本身并不透明，而是有其内在的结构，人们使用语言

来表达思想,就必定受其影响。而且语言本身包含语音和语义,它们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而转移,故而难以把思想表达得准确无误。因此,史家写作就受到文化背景、意识形态、时代条件、语言风格的多重限制,史家想通过语言文字来如实表述过去,实在是痴心妄想。此外,海登·怀特还对历史话语进行自我解释时所使用的策略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他认为,历史话语具有三种解释策略:形势论证、情节叙事、意识形态意义。在每一种解释策略中,都有四种相对应的可能表达的方式供历史学家选择:对形式主义、有机主义、机械论和语境论而言,可用形式论解释;对传奇原型、喜剧原型、悲剧原型、反讽原型而言,可用情节叙事解释;对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而言,可用意识形态解释^[6]。怀特认为,要想真正发现和理解这些不同的方式,必须了解历史写作的性质,也即历史的“诗性”,在怀特看来,历史的“诗性”是历史的深层结构。由此可以看出,为了负载他用以解释真实事件的理论,历史学家往往采用诗人的想象虚构手段去预想历史的展开和范畴。怀特明确的指出,历史学家在整理史实时已经在脑海中“预想”了他想研究的范围以及他将如何使用它所搜集到的史实来获至一种结论,这种预想的表现形式主要体现在作品的风格上,也即作品的语言形式上。怀特吸收了弗莱关于诗的四种语言转义即隐喻、转喻、提喻和讽喻的理论,强调历史的预想可采用这四种形式,由此打通了力主真实再现的历史话语和以想象虚构为特征的文学话语之间的通道。怀特用这种方式归纳历史,就是把历史写作和自觉的诗创作等量齐观。

怀特指出,历史已经逝去,无法重现和复原,能够找到的历史只有关于历史的叙述或者被阐释或编织过的历史。所以,不可能有什么真的历史,因为思辨哲学的编撰使历史呈现出历史的哲学形态,其本身带有诗人想象世界的虚构性。因此,历史的版本就不止一种,严格说来,有多少种理论阐释就会有多少种历史,而人们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其中某个被阐释编织过的“历史”。这种选择与其说是认识论的,不如说是审美的或道德的。因而,怀特在新历史主义理论研究中特别强调历史意识、阐释框架、语言诗意的想象和虚构,因为这就是他的元历史主义的核心。

三、以李洱的《花腔》为例

现在笔者以新历史主义作家李洱的代表作《花腔》为例对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文本观作一个简单的分析。《花腔》的主体构架是三个叙事人白圣韬、赵耀庆、范庆槐分别在抗战年代(1943年)、“文革”期间(1970年)和20世纪末(2000年)向不同的人的“口述纪实”。所有的人的陈述都围绕着二里岗战斗中“死”于日本鬼子枪弹之下的共产党员葛任展开,而中间又夹杂以大篇幅的插叙,对讲述中的内容进行补充、阐释并寻找所谓确凿的证据,其叙述人是作为整个“材料”的整理者和葛任的后人出现的。从一开始的卷首语的安排,李洱就将自己扮演成一个兰克式的严格的历史学家,行文中又将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大摆大摆地引进自己的叙述,一本正经地调查、记录、访谈、核实那些本来就子虚乌有的材料典籍,把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乃至细节都与接受者已知的历史知识连接得天衣无缝,给读者营造出一种“真实效果”的阅读体验来,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读者混淆了历史和小说、事实和虚构的界限。

《花腔》全书除了插叙部分外,其他三个讲述者实际上充当了讲述者与被讲述者的双重角色,角色的频繁变换,时空的大跨度跳跃,使整部小说呈现出光怪陆离的文体特点。而葛任事件与葛任本人一直是在怀疑、诘难、辩驳、猜测和假设中存在的,即使仅存的一些貌似真实的东西也在几个人物的叙述冲突中消解了。当形式被揭穿,文本的真实——即虚构被揭示的时候,刚刚建立

起来的历史认知被瓦解了，所有的事件和人物都被否定了，读者才发现自己被一种历史的陈述方式巧妙地欺骗了。

当历史仅仅存在于讲述之中时，讲述者就享有了前所未有的特权。沃尔什认为：历史之光并不投射在客观的事件上，而是投射在历史的人身上，历史照亮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因为主观性的思维左右着历史叙事，所以历史的客观性便成了水中花、镜中月。《花腔》的讲述者医生白圣韬、人犯赵耀庆以及著名法学家范继槐他们不光见证了葛任的历史，参与了历史的创造，而且讲述了这段历史，他们的讲述不可避免地会选择对自己有利、有用的东西，尽管他们都宣称自己“有甚说甚”、“哄你是狗”，作者本人也煞有介事地去追求所谓的历史真相，但是《花腔》的历史讲述毕竟受对话语境的限制，必然存在想象与虚构的成分。关于葛任生死迷雾存在着多种讲述版本，而任何一种版本都无法穷尽其个人生死的全部真实，历史文本是多样而非透明的。读者一旦意识到这点，就会对历史的叙事产生怀疑。正如南帆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花腔》有意呈现的多种陈述暴露了历史话语背后曾经隐藏的生动建构：七嘴八舌、东鳞西爪、莫衷一是……《花腔》对历史话语的模仿如同一个恶作剧式的揭示。人们终于意识到，历史话语的严谨、明晰、郑重和井然有序并不是天生的；历史话语所欲再现的历史事实头绪分歧，意向杂乱，可以容忍多种主题的阐释。相当多的时候，有条不紊、因果清晰的描述来自历史大叙述对于叙事的全面改造。一旦叙事的意义和功能全面进入人们的视阈，历史话语的真实程度可能遭受严重的怀疑。”^[7]

李洱的历史诗学证明，任何一种叙述都无法客观而全面地覆盖历史真理，任何叙述都要受话语虚构性与权力性的编码。事实和意义就如同巴特所说的永远躲在能指的后面。虽然作品中的人物都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不要花腔”，然而他们越是信誓旦旦，他们距离真实性就可能越远；距离真实性越远，就使得讲述和真相之间的差距越大。究其实《花腔》全文就是一大段“花腔”，历史的本来含义之一就是说谎，就是要花腔。历史成了写在羊皮纸上的迷雾，真正的历史只退化为可望而不可即的阐释背景，而阐释天然就需要花腔的帮衬才能成立。历史的真实性就是这样被新历史主义者放逐的。

四、历史文本观的缺陷

新历史主义把“历史”等同于文本，这固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历史”确实不是“一件事跟着另一件事”的记述，不是无序的文物排列，不是简单发生在过去的事情。我们许多人称历史为话语就是赋予了历史以某种思想的地位，但是我们不能不正视将历史视为一种文本、视为一种叙事话语可能导致的后果。“历史文本论”把语言文本的意义视为一个永无止境的能指符号的置换链，而文本的即刻意义便成了没有确定意义的一种意义的可能性，换言之，它把历史文本的最终所指即那个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件“放逐”了，历史所包含的某些重大范畴被蛀蚀，历史的光芒消退。

后结构主义、结构主义的语言观是一种建立在纯语言层面的构想，然而语言实际运用时总是有其最终所指的，亚里士多德说，“历史”说的是已经发生的事，而“文学”说的是可能发生的事，两者的区别就是一个是否有最终的所指，具有最终所指的历史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关于“虚无”的、可任意阐释的文本，正如盛宁先生所说，“无论‘历史’这个词儿的意义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无论‘历史’这个词儿的意义变得多么不准确，我们都不能忘记，我们依然还是在用‘历史’

来指我们心目中所想的那真正发生于过去的事情。”^[8]联想到纳粹战犯福利森矢口否认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对百万无辜犹太人的屠杀以及日本正史对南京大屠杀惨案的排斥,我们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将历史仅仅视为文本的可能恶果。

参考文献

- [1] 海登·怀特(伍厚恺译). “描绘逝去时代的性质”文学理论与历史写作[A]. 见: 拉尔夫·科恩(程锡麟译). 文学理论的未来[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43-78.
- [2] 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张京媛译). 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A]. 见: 张京媛.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17-49.
- [3] 海登·怀特(王逢振译). 新历史主义: 一则评论[A]. 见: 王逢振, 盛宁, 李自修. 最新西方文论选[C].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99. 496-504.
- [4] 海登·怀特(张京媛译). 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A]. 见: 张京媛.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160-179.
- [5] 海登·怀特(王逢振译). 历史主义、历史和修辞想象[A]. 见: 张京媛.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180-199.
- [6]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第二版.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409.
- [7] 南帆. 小说和历史的紧张[J]. 读书, 2003, (11): 21-27.
- [8] 盛宁. 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159-160.

Historical Text View of Neo-historicism

HUANG Guoyou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Abstract: Neo-historicism challenges the traditional belief of history that boasts of its objective and fair view. It argues that historical events and figures are its expounding object; history in essence is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a text written by means of a unique narrative form. However, this narrative discourse will unavoidably has subjective, imaginary and fictitious components. Therefore the view are often criticized by many experts and scholars of history, saying that it exiles the history itself.

Key words: Neo-historicism; Text; Narration

(编辑: 刘慧青)